

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在毛主席指引的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上前进



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是投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颗重磅炸弹。

这篇文章向我们指出了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在当前尖锐复杂的阶级大搏斗中，一定要用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识破敌人的新阴谋。

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最重要的课题。阶级敌人总是千方百计，从右的方面或极“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个方面，妄图转移我们的大方向，搅乱我们的阵线。陶铸这个反革命两面派，这条反革命的变色龙，就是这样干的。他是从极右的方面到极“左”的方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例子。

毛主席教导我们：“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展，资产阶级司令部

的土崩瓦解，迫使那些垂死挣扎的阶级敌人经常改变自己的策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正在勾结起来，以种种面貌出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用陶铸的那套鬼把戏，极力煽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妖风，挑拨离间，混水摸鱼。这一小撮坏人妄图破坏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破坏和分裂人民解放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支柱；妄图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团结。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革命群众，都应该从姚文元同志这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得到启发，受到教育。要懂得阶级敌人并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斗争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百倍地加强敌情观念，牢牢地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望远镜、显微镜，随时揭穿敌人的阴谋，斩断敌人的黑手。对于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这样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搞阴谋的反革命小集团，必须彻底揭露，彻底粉碎。

群众队伍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思潮，最容易被阶级敌人利

用。敌人从右的方面或极“左”方面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常常从这里寻找弱点，冲破缺口。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样，才能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

在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得到了很大的锻炼，阶级觉悟空前提高。只要我们进一步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武器，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紧紧跟着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敌人不管采取什么狡猾的策略，玩弄什么花招，都逃脱不了被埋葬的命运。

人民解放军是保卫国防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长城。我军广大指战员誓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团结战斗在一起，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为保卫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奋斗到底！

让敌人在我们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必将冲破一切阻拦，走向彻底胜利！（九月十一日）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九月一日通过决议提出当前的八项具体任务：把革命的大批判搞深搞透搞彻底；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搞好区县级单位的夺权斗争；更大规模地开展拥军爱民运动；抓革命，促生产；发动群众，制止武斗；严禁挑动农民进城武斗；依靠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新华社社日讯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通过一个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的决议。

决议首先分析了北京市当前面临着空前大好的革命形势。

决议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正在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批判和声讨。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被粉碎了。全市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仇敌忾，口诛笔伐，掀起了革命的大批判的新高潮。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政治上的优势已发展到组织上的优势，在许多部门和单位掌握了领导权。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正在进一步巩固，革命的“三结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北京地区，人民解放军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三支”、“两军”的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杰出的成绩。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工业生产的形势是好的。在郊区农村，夏粮获得了大丰收，秋季作物也是大丰收的局面。

特别重要的是，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更加深入人心，为越来越多的群众所掌握。

决议指出，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集中火力，集中目标，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并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任务。

决议接着提出了当前的八项具体任务，这就是：（一）把革命的大批判搞深搞透搞彻底；（二）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三）搞好区县级单位的夺

权斗争；（四）更大规模地开展拥军爱民运动；（五）抓革命，促生产；（六）发动群众，制止武斗；（七）严禁挑动农民进城武斗；（八）依靠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决议在谈到把革命的大批判搞深搞透搞彻底时指出，根据当前的情况，搞好革命的大批判，要注意以下几点：（1）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作大批判的武器；（2）从政治上、思想上广泛地深入地发动群众，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采用多种形式，人人识破笔伐；（3）工农兵是革命大批判的主力军，红卫兵小将将是革命大批判的急先锋。在革命的大批判中，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4）加强领导，组织坚强的领导班子，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革命的大批判。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挂帅抓革命的大批判，把搞好革命的大批判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5）抓住要害，突出政治，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搞深搞透；（6）把革命的大批判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批判结合起来，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同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结合起来；（7）把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很好地统一起来。

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中央以及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停止外出串连的规定，除中央特许的以外，任何单位的学生和群众都不得外出串连，已经外出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单位。

决议在谈到进一步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时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成为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分歧是正常的现象，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正常的讨论，采取协商和召开联席会议的方式，通过整风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灵魂。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基础上，认

真地进行整风，克服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

阶级敌人用各种方式破坏和挑拨革命派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有敌情观念，顾大局，识大体，以革命利益为重，千万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

在搞好区县级单位的夺权斗争这项任务中，决议要求一些没有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的区、县级单位（包括市属厂矿企业、高等院校）搞好夺权斗争，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夺权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决议提出要在全市范围内更大规模地开展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的运动。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卫兵革命小将和一切群众组织，要根据各单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制定新的拥军爱民公约。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粉碎阶级敌人破坏军民关系的罪恶阴谋。对于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必须采取专政措施。

决议强调要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以深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动力，进一步掀起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

决议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要坚持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鼓足最大干劲，力争增加产量，提高质量，节约开支，降低成本，力争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离开生产岗位的职工同志，应立即返回原单位参加生产。

郊区农村要做好护秋工作，严防阶级敌人破坏。要搞好秋收秋种，争取丰产丰收，颗粒还仓，并为明年农业的大丰收准备条件。

决议在谈到制止武斗问题时说：武斗往往是阶级

敌人挑起的。要发动群众，戳穿一小撮挑动武斗的坏人的一切阴谋诡计，把这一小撮坏人彻底孤立起来。煽动武斗的一小撮坏人和情节严重的打人凶手，要受到无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制裁。

决议要求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一律不得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对于煽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首恶者，一定要彻底揭露，坚决斗争，依法惩办。

决议还指出，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狠狠打击一小撮犯罪分子的活动。对那些屡教不改的顽固分子以及罪大恶极的分子，应该坚决予以制裁。要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决议在最后一部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中，要求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真正做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指导一切，批判一切，改造一切。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让毛泽东思想占领各个阵地；充分发动群众，不断总结斗争的经验，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抵制和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实现思想革命化；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要结合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真正学到毛泽东思想，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折不扣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在斗争中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掀起新的高潮。

坚决把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批倒批臭

陶铸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

任志友

陶铸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十多年来，一贯紧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竭力反对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阴谋复辟资本主义。他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资本主义道路。他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大肆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毒素，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他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我们一定要和他斗争到底，把他斗倒批臭！

一

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还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关系到是否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大问题。

早在一九四九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出，在全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是我们国内的基本矛盾；人民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一九五七年二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毛主席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当年四月，中国赫鲁晓夫就公开和毛主席大唱反调，胡说什么“现在国内敌人已经基本被消灭，地主阶级早已被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上被消灭，反革命也基本上被消灭了。我们说国内的主要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陶铸紧紧跟上，学着中国赫鲁晓夫的腔调，在当年四月以后的多次讲话中，大谈特谈“阶级矛盾已经基本消灭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

陶铸和他的主子中国赫鲁晓夫，这样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故意抹煞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是要想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以便使他们这一伙反革命分子，大胆放手地推销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货色，最后达到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

陶铸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贯的。每当阶级斗争尖锐激烈的时候，他都要跳出来，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站在阶级敌人的立场上，猖狂地向党进攻，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五五年，我们揭露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在全国范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的时候，陶铸公然为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胡说什么：“目前中国大陆上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的精神状态和他们的处境是可怜的，心情是痛苦的，不是很愉快的。”这真是反革命的感情和逻辑！要让反革命分子“心情愉快”，就必然要把劳动人民打入十八层地狱！陶铸站在反革命立场上，免死狐悲，所以一再叫器，“对反革命分子我们首先讲宽大”。他就是要让反革命分子逍遥法外，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把无产阶级专政淹没在血泊中，实现反革命复辟。

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陶铸就出来大叫：“现在敌人打倒了，不要革命了，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搞生产”，“阶级斗争已经基本消灭了”。他竭力鼓吹“政权的专政职权要削弱，从而转到领导生产，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调整人民内部的矛盾方面去”；他还说什么“匈牙利事件肯定不会在我们中国发生，……大家可以好好睡觉”，“就是看到有‘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也要首先检查我们有没有不对的地方”。人们看见过各种各样的叛徒，但是象陶铸这样跪倒在敌人面前，说你们反革命是因为革命人民有错误，这样的叛卖行为还没有见识过。真是，如果把叛徒比作虱子，虱子也会感到耻辱的。在毛主席发出号召，全国人民已经向右派进行反击以后，陶铸还公然说：“对右派的斗争不能说是敌我之间的斗争”。当然，对于陶铸来说，右派分子以及一切反动派都是“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问题，因为陶铸自己就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的大头目！所以他也这样明目张胆地鼓励和掩护右派向党进攻。

一九五九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猖狂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陶铸又出来为他们打气，要他们“永不屈服于恶劣的环境”，要“经得起狂风暴雨的侵袭”。后来，当中国赫鲁晓夫为右倾机会主义刮起“翻案风”时，他又跳出来大叫“犯了错误，这三面红旗应该讲褪色了”，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退长官僚主义”；另一方面，又向地富反坏右颂送秋波，说什么“反右派以后，两条道路问题基本解决了，今后党内外已经互相信赖，加强

团结，同舟共济”，“我们应该交朋友”。他和阶级敌人交了“朋友”，所以干脆宣告：“我们没有阶级矛盾，是主观与客观的矛盾”。陶铸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真是登峰造极，大大超出一般新老修正主义的水平。

一九六二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作了社会主义社会中间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报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战斗号召，完全揭穿了陶铸之流的阴谋。但是，在这之后，陶铸仍然公开和毛主席唱反调，胡说什么“剥削阶级，基本上被消灭了”，“凡是搞阶级斗争而影响和妨碍了生产的，都是错误的”，“资产阶级已不是完整的阶级了，是残余的阶级。”他并且对这“残余”的阶级，大肆吹捧，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是“搞革命的”，是“搞社会主义”的，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资产阶级”。他就是这样一仆倒任在资产阶级脚下的奴才！

够了，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清楚陶铸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为的是可以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心情愉快”地放肆地搞复辟活动，让陶铸之流和他们“同情共济”，把无产阶级专政偷偷地改为资产阶级专政。

二

新中国诞生之后，在全国人民面前摆着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毛主席指出：“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毛主席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求我们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立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经济基础，把革命推向前进。与此相反，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确保私有财产”等口号，竭力抗拒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陶铸紧跟追随他的主子，在一九五三年，提出“要稳定新的生产关系，保护私有制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为此，他大肆鼓吹“勤致富”，大力宣扬买卖土地、借贷、雇工、贸易等“四大自由”，并且荒唐地提出党员和干部要带头放债，不要怕“割刺痛的帽子”，拼命抵制社会主义改造，妄图使中国革命停顿下来，以便逐步实现他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梦想。

在全国实现合作化以后，对于这个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满腔热情地支持它、巩固它、发展它，还是攻击它、破坏它？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在经济战线上又一次尖锐的斗争。

毛主席及时指出：“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坚决打击资本主义倾向。这时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提倡无产阶级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自由竞争，自由发展，动手大吹农业生产合作社。陶铸也跟随其主子，大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一九五七年，趁着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机会，煽起一股退社的黑风。他大肆宣传“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闹退社，我们完全让他们退，他们完全有自由，也是合法的。”妄图瓦解和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一九五八年，揭开了我们伟大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灿烂辉煌的一页。人民公社象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喷薄而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迎风招展，显示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显示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

陶铸这时候又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起，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恶毒地污蔑党中央“头脑发热了”，“搞得太快了”。一九六〇年以后，他猖狂地对三面红旗发动了全面攻击。这个丧心病狂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闭眼不看三面红旗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的促进，不看在中国红旗指引下取得的伟大成就，不看三面红旗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的丰富经验，不看三面红旗在抗御三年自然灾害和在抵抗苏修对我们的破坏中所起到的伟大作用，胡说什么“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犯了严重错误”，恶毒地攻击和诬蔑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说我们搞的是“贫困的痛苦的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他积极鼓吹所要所谓“富裕的快乐的社会主义”。怎样达到他所要的“富裕的快乐的社会主义”呢？请看他所开的一张方药：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日，他在广东省委召开的电话会议上说：“我们不怕自反势力，现在不是自反太多，而是统得太多。”这就是要让资本主义经济大肆泛滥。

同年十二月，在广东省三级干部会议上又说：“即使有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活动，最多也是出几个‘小販资本家’，这有什么可怕！”这就是要培养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就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大力推行“包产到户”，积极“恢复农村集市”，鼓励“私人开荒不受限制”，甚至公然提出“单干可以”的号召。

很清楚，陶铸鼓吹的这个药方，是彻头彻尾的复辟资本主义的药方！

在社会主义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还是鼓吹物质刺激，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在经济战线上斗争的关键问题。

和一切新老修正主义分子一样，陶铸一贯反对突出政治。早在土改后不久，他就曾提出过“生产压倒一切”，“全力转向生产”的口号。当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日益发展，日益巩固的时候，他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样，为了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化变质，便更加起劲地鼓吹起“生产第一”和物质刺激来。一九六一年他公开宣称：“过去我们搞东西靠政治的办法，……那样不仅搞不到，而且破坏生产，越搞越少，现在要采取经济的办法。”他污蔑政治工作是“说空话”，“放大炮”，“不能当饭吃”，宣传什么“生产观点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的集中表现，有无生产观点，就是有无群众观点的试金石。”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样，他也提倡什么“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增产就是马列主义，减产就是主观主义”。在陶铸亲自提出的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八条”中，竟没有一条讲的是政治。甚至连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也把“清政治”放在了极其次要的地位。陶铸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必然突出资产阶级政治，把“物质刺激”，“利润刺激”，“奖金刺激”这一套泛滥成灾，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

事实上，陶铸从“生产第一”的观点出发，把苏修的一套一古脑儿搬过来了。他鼓励各级党委全力抓生产，要变成“养猪党委”、“粮食党委”、“绿化党委”。如果按照陶铸这一套去办，我们的工厂、农村就要变成繁殖修正主义的摇篮、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我们的党就要变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党；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就要变质，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就会被害虫、吸血鬼、投机商等这些蛀虫所蛀空。陶铸的险恶用心在此！

三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陶铸这个老谋深算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是很懂得“软刀子杀人”的厉害。他大力抓文学、艺术、新闻、教育等，就是企图利用这些阵地，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素，抗拒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以便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

首先，他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歪曲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使文化艺术很好地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定的阶级政策，它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反资兴无的斗争服务的。但是陶铸却采取偷天换日的手法，抽掉它的阶级内容，塞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黑货，以适应资产阶级需要。他一再鼓吹：“什么主义，什么派别，什么论调，都应该允许它存在，让它‘开放’与‘争鸣’，不能‘只准你‘放’，不准我‘放’，只准你‘鸣’，不准我‘鸣’”。千方百计地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争地位，争发言权，千方百计地取消无产阶级对于这些思想敌人的斗争。在他的鼓吹和支持下，广东和中南地区文艺界乌云翻滚，群魔乱舞。在戏剧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在文学艺术作品方面，《三家巷》、《苦斗》、《艺海拾贝》、《花城》、《唐诗小札》、《韶山的节日》等毒草纷纷破土而出，流毒全国。在电影界，《逆风千里》、《齐王求将》、《刘明珠》、《南海潮》等反动影片充斥银幕，毒害观众。陶铸还要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旨意，通过鼓吹“海瑞精神”，宣扬“包公替民伸冤”，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叫好，替被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翻案，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陶铸还赤膊上阵，亲自出马，向党献出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两支大毒箭。当陶

铸放手叫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恶毒阴谋遭到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抵制和批判的时候，他立刻露出了一副凶煞相，胡说“我们有些同志一脸的‘秋风萧瑟’”，“秋风一来，树叶脱尽，还有什么百花齐放呢？”陶铸的所谓“放”和“鸣”，实际是只许牛鬼蛇神为复辟资本主义狂吠乱叫，而不许无产阶级对地主资产阶级进行批判和反击。陶铸这种恶毒的手段，不仅彻底暴露他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爱谁恨谁，而且也再一次暴露了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的虚伪性：只许你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不许毒草自由泛滥！

陶铸还紧紧抓住最能影响群众思想和政治情绪的新闻阵地，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舆论。他公然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办报方针，公开抛出“移风易俗，指导生活”的反动的办报纲领，为宣扬资产阶级的货色，大开方便之门。在陶铸这条办报黑线领导下的《羊城晚报》，长期以来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刊登反映国内重大阶级斗争的新闻，而在大肆宣扬冷风暴雨、吃喝玩乐等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情调，什么风月人情、笑话掌故、花鸟虫鱼、琴棋书画等低级而庸俗的东西，充塞版面。这张报纸的副刊《晚会》成了牛鬼蛇神的大集会；《花地》成了毒花毒草的丛生地；《五层楼下》借题发挥，极尽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之能事。十几年来，中南地区许多报纸刊物，根据陶铸规定的黑方针、黑纲领，射出一支支的毒箭，打出一颗颗五颜六色的糖衣炮弹，把报纸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了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和平演变的工具，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全国报刊先后加以转载，唯独陶铸领导下的《湖南日报》拒不转载；去年四月，当“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阴谋败露，旧《北京日报》干部发表了假批判、真包庇的黑材料之后，全国报纸都不加转载，唯独在陶铸卵翼下的《广州日报》独家转载。这一切，又从一个方面向我们进一步说明：阴谋家的反党活动是无孔不入的。陶铸妄图利用报纸这一天天同群众见面的工具，一点一点地地挖无产阶级思想塞到人民群众的脑子里去，真是恶毒极了！

陶铸还把他的黑手伸向了教育界，同无产阶级青年一代。他反对毛主席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吹捧中国赫鲁晓夫的家传家宝的黑思想，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他大肆提倡读书黑一、分教第一。胡说什么提高教学质量就是“使初中能够升高中、高中能够升大学”，说什么当“专家”，当“领导者”才是远大前途，当工人、挖煤炭就是“浪费能力”，大肆传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主义反动谬论。他还经常摆出一副“青年导师”的面孔，向青年灌输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生观，推销中国赫鲁晓夫“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市侩哲学，说什么“把个人利益看得很轻，国家便会重视他，信任他。这样的人，愈不闹个人利益与名誉地位，那他就一定会有很好的荣誉和地位。”陶铸宣扬这一套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使青年变成鼠目寸光的个人主义者，成为陶铸之流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陶铸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干的这一系列罪行，集中到一点，同中国赫鲁晓夫一样，就是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领域。他们知道，光焰万丈的毛泽东思想一经亿万群众所掌握，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就做梦不成。所以陶铸多年来根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甚至连报纸上刊登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在舞台上搬演手拿《毛主席语录》，他都疯狂地反对。他挥舞“庸俗化”的大棒，污蔑广大工农兵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和尚天天念经”，“有啥用”。他疯狂地攻击光芒万丈的“老三篇”，胡说“‘老三篇’很简单，干部没有什么可学”。陶铸拼命地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归根到底，就是不让无产阶级掌握强大的思想武器，使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进攻面前完全解除思想武装。

姚文元同志《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深刻地勾画了陶铸的政治面目：“陶铸完全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是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和宣传者，是一个混进来的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他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的政治方向。他极端仇视社会主义，他日夜向往着资本主义。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

对于这样的人，只有把他挖出来，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胜利前进

——纪念秋收起义四十周年

张 秀 川

四十年前，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关键时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了第一支新型的工农革命武装，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在中国革命史和我军的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一)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在蒋介石制造的白色恐怖中，血的事实宣告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是：是取消革命斗争，屈服于敌人的屠刀之下？还是拿起武器，继续战斗？正是在这个中国革命发展的生死关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战胜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即投降主义路线，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只有拿起枪杆子，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引导中国人民走向解放。正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接着，“红旗卷起农奴戟”，在湖南农民运动基础上，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是中国革命运动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向胜利的开端。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但彻底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也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当时，摆在我们党面前的另一个尖锐问题是：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左”倾机会主义者幻想在敌人长期盘踞的中心城市发动起义，迅速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我们的伟大舵手毛主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和智慧，清醒地估量了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革命的特点，提出了著名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口号。他还

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武装斗争，最后夺取城市，夺取全国政权。这是毛主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天才的创造性的伟大发展。

(二)

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秋收起义的一个伟大历史功绩，就是在毛主席的建军思想指导下，开始建立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之人民军队。

怎样才能建设一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军队呢？毛主席在中国工农红军初建的时期里，在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尖锐斗争中，就为我军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无产阶级的建军纲领。

一开始建立红军，毛主席就紧紧抓住了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军事，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部队这个建军的根本问题。

毛主席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军队从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资产阶级的军队，是资产阶级镇压和掠夺劳动人民的工具。资产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掩盖这一点，不敢承认军队的阶级本质。无产阶级却要大力宣传这个观点，使我们的每一个战士都懂得这个军事

服从政治的道理，从而自觉地、积极地为实现无产阶级政治任务而斗争。

在红军初建时期，毛主席给红军具体规定了打仗、筹款（后改为生产）、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制定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当时红军每到一地，就立刻深入群众，展开宣传和组织活动，积极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建立游击队、赤卫队等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土地革命，不断扩大和巩固农村根据地。当时的工农红军，正是在毛主席军事服从政治的思想指导下，把做群众工作看作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结果，使军队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从而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穷力量。

为了使红军真正成为“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毛主席强调必须把部队放到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必须保证“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三湾改编，突出地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毛主席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决定将支部建在连上，营、团成立党的委员会，在连以上各级组织设党代表，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使部队有了政治灵魂和领导核心。

毛主席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整个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创建不久的年轻的红军，面临着艰难的处境。强大的敌人不断地疯狂“围剿”，红军内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存在。由于在连队建立了党的支部，以党员和积极分子为骨干，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使支部成为保证战斗胜利和完成各项任务的坚强的战斗堡垒。这就保证了红军在无论多么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在严峻的战斗考验中，能够“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毛主席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是秋收起义和红军初建时期，毛主席从政治上建军的一项主要内容。这种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事情。一切剥削阶级所豢养的反动军队，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他们的反动本质，决定了他们的官兵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在军队内部，形成了尖锐的阶级对立。毛主席创建的工农红军，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本质出发，建立了一整套新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度。在红军里，干部以阶级弟兄的感情和态度对待士兵群众，官兵在政治上是平等的。连队建立了革命士兵委员会，经济公开。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迅速荡涤了从封建雇佣军队带来的种种恶习，树立了新的革命风气，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调动了广大士兵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官兵一致，团结对敌，使红军部队面目一新。当时在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条件下，尽管物质生活极其艰苦，但是精神上却十分愉快，特别是一些刚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战士，得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军队，阶级觉悟迅速提高，精神上有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国民党军队里是个胆小鬼，今天到了红军却变成了勇敢的战士。

“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光辉的建军思想，就是在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中，和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在我军历史上，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一直是围绕着政治第一还是军事第一，突出政治还是突出军事这个根本问题进行的。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人，总是干扰和对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们死抱住单纯军事观点不放，把毛主席给工农红军规定的三大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叫嚷什么“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要以军事第一来代替政治第一，要以军事领导政治，公开提出“司令部对外”的荒唐口号，妄图取消党对红军的领导，取消政治机关和政治思想工作，把红军引向脱离无产阶级领导的那路上去。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在斗争中不断地战胜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在我军建军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就是红军初建时期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胜利总结。这个决议批判了各种非无产阶级路线的错误思想，指出其表现、来源及纠正的方法。这个决议使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是毛主席建军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几十年来，我党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建军的基本路线，还是毛主席当时制定的这一条正确路线。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进一步将政治工作内容，概括为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这样三条基本原则，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无比的威力。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亲自规定了开展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为我军政治工作的方针，并且亲自领导全军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这是我军政治工作和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发展，对于人民解放军队的巩固、壮大和夺取全国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几十年来斗争实践充分证明，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完整、最科学、最伟大的军事理论，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最高峰，是我们战胜一切强大的敌人，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的根本保证。

(三)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极其尖锐、复杂。这种斗争，必然地要在我们军队内反映出来。毛主席教导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资产阶级要搞复辟，一定要抓军队，抓枪杆子。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要反复辟，也一定要抓军队，抓枪杆子。两种建军思想、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争夺兵权的斗争。中国赫鲁晓夫和彭德怀、罗瑞卿，长期以来，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改造”我们的军队，使军队变成他们篡党、篡政，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必须看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有失去政权的危险。无产阶级掌握军权以后，也有失去军权的危险。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资产阶级复辟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是，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两种建军思想、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就可避免地长期存在，而且，在一定时期是十分激烈的。

建国以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思想、建军路线同资产阶级建军思想、建军路线斗争的焦点，一直围绕着突出政治还是突出军事，政治第一还是军事第一这个根本问题。中国赫鲁晓夫和彭德怀、罗瑞卿，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建军路线。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嚷：毛主席著作“过时了”，“不适用了”，胡说什么“军事就是政治，军事政治应该并重”；彭德怀、罗瑞卿还公然叫嚷“在现代条件下作战主要就是打钢铁，打技术，而不是打政治，打勇敢”。极力散布“政治不能上天，政治不能出海”的反动谬论。

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领会最深、用得最活，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几十年来，在中国革命发展的转变关头，在历次两条路线斗争中，他都是旗帜鲜明地、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最英勇、最忠实、最彻底地捍卫和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并且系统地阐明了和创造性地发挥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林彪同志主持制定的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继承和发扬了古田会议的优良传统，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全面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军队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丰富经验，彻底清算了资产阶级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对我军的影响，进一步确立了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和建军路线在我军的绝对领导地位。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创造性地提出和强调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贯彻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四好连队运动等一系列方针、原则和重大措施，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治建军思想和无产阶级军事路线，从理论上作了最好的发挥，在实践上作了最坚决最坚决的贯彻。正如毛主席所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我们的海军部队，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林彪同志直接领导下，大力突出政治，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改变了广大官兵的精神面貌。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几年来连续获得了空战和海战的胜利。事实证明：我们就是靠政治上了天，靠政治出了海，靠勇敢，靠人的因素打了胜仗。这就彻底粉碎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无耻谬言。

我军四十年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离开了毛主席政治建军思想和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就失去了灵魂，失去了方向，失去了统帅，就必然要走错路，打败仗。我们要永远地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政治建军思想，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胜利前进。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我们来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四十周年，感到无限亲切，无比鼓舞。我们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目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了决战阶段。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运动，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我们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高举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保卫国防和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战斗任务中，在“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中，在各项斗争和工作任务中，争取为人民立新功。

跟着毛泽东，世界一片红

纪念伟大的秋收起义四十周年

高等军事学院“红联”兵团

一九二七年九月，正当中国革命处在危急关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高举武装斗争的革命大旗，在湖南农民运动的基础上，亲自组织和发动了农民暴动，举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创建了第一支由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立起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从此，开创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直接掌握武装，深入农村，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

毛主席这一伟大创举，极大地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为中国人民开辟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也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彻底解放，开创了一条新的航道。

毛主席说：“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行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这就告诉我们：搞革命必须把根子扎在农村，依靠农村生长和积蓄力量。在农村杀出一条路来，然后将革命推向城市，夺取全国政权。

这就告诉我们，革命战争必须波浪式地推进，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一块一块地夺取敌人的阵地。绝对避免在力量不够时，同强大的敌人决战。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我们党内曾连续出现了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毫无例外地都是反对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们不是指使共产党领导少数工人群众举行毫无胜利把握的城市暴动，就是命令弱小的红军去攻打大城市。结果，只能在强大的敌人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中国的赫鲁晓夫和陈独秀、王明一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修正主义者。他既是一个“议会派”，又是一个“城市暴动”的吹鼓手。几十年来，他一

贯反对毛主席的首先深入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全国胜利以后，他仍然利用一切机会散布他那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谬论。一九六二年，他还胡说什么“革命的胜利，是城市到乡村，还是乡村到城市，其结果都是一样，不是原则问题”。

果真是这样的吗？不，完全不是。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为了推行其“由城市到乡村”的机会主义路线，使白区党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使根据地和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难道这“不是原则问题”吗？

中国赫鲁晓夫一派胡言乱语的流毒，使有的兄弟党的斗争受到了严重的挫折，难道这也“不是原则问题”吗？

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一谬论，实质上是为他自己的罪行开脱，为王明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也是为了适应美国帝国主义的需要，配合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妄图把世界革命引向邪路上去。

“跟着毛泽东，走中国革命的路。”这是世界革命人民从自身的革命经历中得出的一条结论，也是他们发自肺腑的呼声。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依靠农村根据地，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把一百多万现代化装备的美伪军，打得焦头烂额，进退两难。

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缅甸共产党，坚持了长达二十年的武装斗争，农村游击战争的烽火，燃遍了缅甸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

老挝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战争中，也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泰国、菲律宾等国革命人民，在农村开展的武装斗争，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着。

在纳苏蒂安—苏哈托血腥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的革命人民，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下，也杀出来了，正在深入农村，展开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

印度大吉岭地区饥饿的农民，在印度共产党革命派的领导下，也拿起枪杆子造反了。

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武装斗争，正风起云涌。

展望世界，形势一片大好。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寿命不会太长。“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

跟着毛泽东，世界一片红。

苏修的诽谤损害不了伟大的中国

声明最后说,《消息报》对伟大中国人民的诽谤,“只不过是贼喊捉贼,把真正的罪责嫁祸于人的又一例而已。”

据报道，佐藤在台湾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进行了两次秘密会谈。他在浪回日本时发表的书面谈话中叫喊：“在亲切友好之气氛中”就日蒋关系、反共反华等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在发表由日蒋所谓“联合公报”时透露，日本佐藤反动政府将继续加紧对我国领土台湾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

佐藤这次窜入我国领土台湾，明目张胆地与中国人民为敌，为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效劳。他同蒋匪帮头目严家淦、蒋经国、老牌汉奸何应钦等进行了广泛的勾结。

简明新闻

新华社十二日讯 我国外交部新闻司负责人今天召见日本驻京的九名记者，正式宣布日本《每日新闻》、《产经新闻》和《东京新闻》三家报社的三名驻京记者，应在限期内离开中国。

新闻司负责人指出，日本佐藤内阁是日本历届内阁中最反华的内阁。它一贯追随美帝苏修，执行亲美联苏反华反人民的反动政策。最近以来，佐藤更变本加厉，不顾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强烈反对，亲自出马，同中国人民敌蒋介石集团加紧勾结。这是公然根据于我国的内政，公然与七亿中国人民为敌的严重的政治挑衅。

新闻司负责人又指出，上述三家报社和它们的驻京记者一直替反动的佐藤政府反华反人民的罪恶勾当招摇喊反，甚至不顾我们提出的严重警告，多次在报刊上刊登宣传和漫画，肆无忌惮地诬蔑我国文化大革命，歪曲报道我国国内的情况，进行反华活动。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竟然恶毒

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北京草场中学革命师生和来校执行军训任务的解放军指战员，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拥军爱民”的旗帜，深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这是同学们和解放军同志在一起制订拥军爱民公约。 新华社记者 楚英摄

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武汉第三米厂的革命派工人，和八一九部队的同志一起学习，一起战斗，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新华社记者 谭克德摄

驻青海某部指战员，用毛泽东思想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与革命群众并肩战斗。这是他们与革命群众一起写揭发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

新华社记者 安克仁摄



四川自贡市人民武装部坚决地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想革命派所想，急革命派所急。这是自贡市人民武装部副部长李宗伯同志向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受到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记者 游云谷摄



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和解放军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广大贫下中农表示，要更好地向解放军学习，协助解放军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本报记者 王景仁摄



驻京部队某部指战员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地同驻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社员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掀起了对中国赫鲁晓夫大批判、大斗争的高潮。决心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中国的赫鲁晓夫。

杨昌忠摄

福建前线军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军民团结如一人，随时准备给敢于来犯之敌以毁灭性打击，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祖国的安全。

新华社稿